

社会定在对资本关系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张一兵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统治性的社会总体性,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进程的起点,是资本将传统社会中的劳动生产过程和生产目的从形式上从属于自己,逐步以生产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活动中每一个环节,并且将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过程的发展,整个从旧社会赋型中突现出来的社会定在开始从形式上对资本的从属,转变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这也表现为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盘剥的转换,这示兆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胜利。

〔关键词〕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式从属;实际从属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10.002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面对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的做法是从流通领域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C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sproceß)的标题下,马克思这一次专门标注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Einheit des Arbeitsprocesses und Verwerthungsprocesses)。这是在接近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的科学把握: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使用价值和抽象劳动生成价值增殖的统一。笔者发现,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的一个新的方面,是更加深入地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获得统治地位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旧有的生产方式逐步地从形式上从属资本关系,到整个社会定在实际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转换过程。其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相对剩余价值盘剥,成为雇佣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关系的关键性基础。这一多重从属关系的说明,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最重要的科学说明。

一、历史性的形式从属:占统治地位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开始认识到:“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21ZDA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 (gesellschaftliche Weise der Production),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 生产过程从属 (Subsumtion) 于资本, 或者说, 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 (Verhältnis von Capital und Lohnarbeit) 为基础, 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 (bestimmende, herrschende Produktionsweise) 的生产方式”。^[1] 不难看出, 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那样的推敲不同, 这显然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胸有成竹的正面指认。然而, 这段表述的构境背景是复杂的。这并非是抽象地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而是在《大纲》的丰厚思想成果之上, 将其置于它历史生成的复杂社会结构之中。在《大纲》中, 马克思正确地发现现实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物相化^[2] 中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复杂现象, 并且确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总体性的重要观点。这里, 马克思眼中的历史现实关注点是封建社会的后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将旧有的生产方式从形式上从属于自身, 逐步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或者是历史辩证法中的主要矛盾关系。这也意指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复杂社会定在中统治性的社会总体性, 决非一蹴而就, 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逐步重构的历史过程。具体说, 这一进程的起点, 是资本将传统社会中旧有的劳动生产过程从形式上从属于自己, 在历史辩证法的构序结构中,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形式到内容的转换过程, 由此, 逐步以生产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活动中每一个环节, 并且将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 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物相化关系编码。笔者认为, 马克思此处刻意使用的 formelle Subsumtion (形式从属) 与下面的 reale Subsumtion (实际从属) 概念, 基本还是属于他面向一般读者的阐释性话语构境。因为, 这是比较通俗易懂的表述。下面, 我们就来

看一下这一历史过程。

其一, 资本将非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形式上从属自己。这有两个层面: 第一, 劳动生产本身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关系。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的生产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拥有自己特有的生产, 而先是在封建社会发展后期遭遇到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过程 (Arbeitsprocesse)。资本的做法, 是先将这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过程从形式上归属于自己的生产关系。依我的观点, 马克思之所以一上来讨论 Arbeitsprocesse (劳动过程), 而不是生产过程, 并不是一种理论逻辑判断, 而是因为他精准地体会到在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 经验性的劳动主体性和工艺性的在场还是生产的主导方面。这是极其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观点。他分析说:

资本在它开始形成的时候不仅控制了一般劳动过程 (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 而且还控制了特殊的现实劳动过程 (wirklichen Arbeitsprocesse), 这些劳动过程在工艺上 (technologisch) 处于资本找到它们时的状况, 并且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nicht c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基础上发展起来。^[3]

资本一开始遭遇到的劳动过程, 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现的, 比如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下农业生产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 以及手工业生产等。一是这些生产的本质为依存于“自然辩证法”物质编码整体的非物相化劳作, 但资本很快就使这些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的历史性在场, 并使其逐步转换为物相化的工业生产, 这是一个劳动生产物相化本身的否定性革命。二是这种 Subsumtion (从属) “最初只是在形式上 (formell) 使它从属于自己, 丝毫不改变它在工艺上的规定性 (technologischen Bestimmtheit)”。这里的 formell (形式) 当然是指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物相化赋型, 所以此处马克思的从形式上从属 (formelle Subsumtion) 的意思, 就是在不直接改变劳动过程的旧有社会关系赋型

的情况下,使之开始为资本控制下的商品生产服务。这使得劳动过程本身的在场性从基根上发生了目的上的爱多斯(eidos)迁移。就像作为封建社会基础的自然经济中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过程,资产阶级开始并不会直接改变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物相化过程的具体改变对象的工艺,而只是“为我所用”地直接利用这些传统的劳动生产过程,然后再将它们逐步改造成自己特有的工业生产物相化和商品生产形态。比如,将贵族手中葡萄园中的自用农产品生产,转换为工业生产中的葡萄酒商品生产,将地主旧有畜牧业中的绵羊放养,转换为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之上的羊毛工业和商业。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表层中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封建地主的,可劳动生产过程的真实在场业已开始受制于工业生产物相化、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客观经济法则,这也使得社会物相化中的关系赋型和编码逐步发生异质性的改变,农耕生产中的“自然辩证法”支配开始转向人所创制的工业和经济物相化活动中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看不见的手”)运动。

第二,是劳动者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关系。这里所说的让劳动过程从形式上从属于自己,也是指资本开始支配和监督劳动者的劳动活动。马克思说:“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即劳动过程被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就在于工人作为工人受资本或资本家的监督,因而受其支配”。^[4]虽然,这时现成的劳动生产过程是在传统生产方式中生成的,当农产品生产转化为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生产,资本家就会十分迅速地让土地上的农民解放成一无所有的工人,并将其主体性在场控制起来为自己的逐利活动服务。马克思说:“劳动过程,从而劳动和工人本身,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受到资本的监督 and 支配。我把这称作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formelle Subsumtion)于资本”。^[5]这应该也会是劳动主体物相化的一个具体转换步骤,历史辩证法基根上,随着农民转化为工人,劳动的主体性逐渐消隐于“资本的生产

性”。这当然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的一个新的观点。

其二,劳动生产的目的是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这是一种资本关系构序生产创制中关键性的改变,因为,传统劳动本身的目的和爱多斯之相都会因此发生转换。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场境(gestaltet die Produktionsweise),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eigenthümliche Produktionsweise)”。^[6]我觉得,这个gestalt(场境)是独具匠心的。依概念考古的词频统计,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共计167次使用这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gestalt(场境)概念。开始,资本并不直接改变旧有生产关系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过程,但通过一种无形的场境关系赋型引导它们从形式上从属于自己,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让它们入序于商品生产和交换市场(无形的场境)生成的经济构式负熵进程,由此,生产的目的(telos)不再仅仅是通过塑形和构序物品的用在性价值满足人的直接需要,而是转码为工业生产物相化的基础上,成为追逐交换价值的“卖钱”。比如,原来农业生产中为了满足直接吃饭的“口粮”,开始变成资本家谋利的“商品粮”;原先手工艺工匠生产一把椅子,其目的是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坐”这样的需要,而资本则让这种工艺生产逐步地转换为无限制的批量椅子生产,生产的目的是变成了换回金钱的“可卖”的商品生产。这样,生产物相化生成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就服务于经济物相化中商品的价值创造和市场实现,资本营造的金钱场境关系赋型和编码机制则会逐步改变一切存在的颜色。所以,这种formelle Subsumtion(形式上的从属),也是使传统生产的目的是逐步发生一个转换,即从生产劳动塑形对象的用在性产品到生产抽象财富的商品和货币的转换,或者说,生产物相化中劳作爱多斯实现出来的产品用在性,只是赚钱的从属目

的。这当然是整个社会定在和生活的根本性改变。马克思指出：

因此,我们把这一切称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c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proceß auf Grundlage des Capitals*)。这里的问题不是要生产产品,而是要生产商品,即专供出售的产品。而且,生产商品不是简单地为了通过它们的出售来获得存在于流通中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保存并增加预先存在的价值。^[7]

如果原先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农民生产粮食是为了地主和自己吃饱,铁匠铸造打铁工具是为了自己和他人使用,生产的目的是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产直接消费的产品用在性的使用价值,而当传统的劳动—生产过程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之后,生产的目的是转换为**专供销售的商品**,特别是在工业生产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之上卖出商品获得的越来越多的货币,这一切改变的背后,则是资本家在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的追逐。马克思后面将指认,在社会定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方式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盘剥绝对剩余价值。

其三, **劳动本身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如果生产的目的是已经开始转换到商品生产,那么,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工人当下的活劳动从属于作为过去对象化劳动(资本)的情况。马克思说:

当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生产的真正目的,或者说,当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Production capitalistiche*)的时候,劳动过程对于资本的起初只是形式上的从属(*formelle Subsumtion*),活劳动(*lebendige Arbeit*)对于对象化劳动,现在的劳动对于过去的劳动的从属,就使劳动过程本身的方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因而,同资本关系(要使它以发展的形式出现)相适应,也有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的发展。^[8]

马克思说,当劳动过程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从满足人们的直接需要转变为商品生产和追逐剩余价值时,也就深刻地改变社会定在中的生产关系,资本所需要的是从土地上脱型出来的自由劳动力,这里出现的是“活劳动对于对象化劳动,现在的劳动对于过去的劳动的从属”的本质,正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奴役性支配,“活劳动”和“现在的劳动”是工人的劳动,而“对象化劳动”和“过去的劳动”并不是具体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条件的用在性(对象化劳动 I),而是劳动交换关系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对象化劳动 II),这正是资本关系被遮蔽起来的本质。这里,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关系成为统治性的生产关系,传统农业和手工艺劳作中主体性的劳动过程,也从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产品生产转换为资本控制的工业生产物相化基础上客观的商品生产过程,劳动活动本身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生产能力则转换为资本金钱爱多斯的生产 and 自我增殖能力。

其四,整个生产过程从属于**生产资本**。在我看来,这应该是马克思判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一条底线,即从财产多少的流通领域到真正创造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领域的转换,在这里也就表示,使传统社会生活从形式上从属于自己的那个资本关系,主要不是流通领域中主导商品交换和货币流动的商业资本或生息资本,而是入序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认。马克思还专门界划说,这里使整个社会定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使生产过程从属于**生产资本**。他告诉我们:

使生产过程从属于自身并执行劳动的购买者和使用者的职能的资本,称为生产资本(*Productives Capital*)。只有资本使生产本身从属于自己,因而只有资本家进行生产,资本才作为一定生产时期的起支配作用的特殊形式(*specifische Form*)而存在。^[9]

这是马克思重点讨论的对象。他十分清楚地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生产关系的资本,不是作为“资本的派生的和第二级的形式,例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商人和高利贷都有可能是旧有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它们都从形式上从属于**直接支配了劳动—生产过程的 Productives Capital(生产资本)**。这也因为,主要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和高利贷的放债者并不购买雇佣工人的“劳动”,也不会组织生产商品,只有工业资本家才会将货币投入到商品生产过程中占有工人劳动物相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生成“一定生产时期的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关系。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有时也将生产资本写为**产业资本**,或者**工业资本**。他指出,“商业形式和利息形式比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即产业资本更古老。产业资本(industrielle Capital)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其他一切形式都不过是从这个基本形式派生的或次要的,——派生的,如生息资本;次要的,也就是执行某种特殊职能(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如商业资本”。^[10]这里的 industrielle Capital,也可译作**工业资本**或**实业资本**。它还隐喻着两个深刻的现实历史关系递进:一是工业生产物相化过程对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非物相化自然经济生产的根本性替代,因为,也只有^在工业生产中,才可能出现劳动改变自然对象物质存在方式向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质变,以及产品极大丰富的现实性。二是从流通领域中的早期资本主义商业交往和金钱交往向实业性生产的转换,因为,单纯的商业活动和金钱游戏是不可能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直到后面的《资本论》第二卷中,他评论说,产业资本是惟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

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11]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产业资本,才会生成“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它包含着资本对工人的直接支配和经济剥削,也只有它才会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不断地改变生产的“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进程),最终变革整个“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经济构式负熵进程)。

马克思还专门说,说到生产资本时,当然也不是仅仅将其狭义地当作工业生产**产业领域**中的资本,而是要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关系”(ganze Verhältniß)。这也意味着,前面讨论的所有劳动过程、劳动生产目的和劳动本身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都是从属于生产资本。因为,正是这种将传统社会中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物相化过程,直接转换为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创造抽象财富(价值增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才会创造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

只要资本作为资本进行生产,资本的独特的产物就是剩余价值本身;在资本的价值增殖中,只要劳动并入资本,劳动的独特的产物就不是这种或那种产品,而是资本。劳动过程本身仅仅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这同使用价值在这里只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完全一样。^[12]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转换过程。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过程,已经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原先在传统社会中业已存在的生产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物相化过程,现在同时成了生产商品价值(增殖)过程的基础,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一般劳动物相化中满足人们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而是工业生产基础上经济物相化编码中商品的价值增殖——剩余价值,这里的价值增殖是由生产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吸纳活劳动实现的,这也是资本自身创制的经济物相化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

还分析说,“现代资本(modernen Capitals)或已支配生产方式的资本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只能是支配生产过程本身的资本形式,也就是‘生产资本’(productive Capital)。(这应当是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以流通为前提,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性或生产过程的条件)。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在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面前独立化。劳动条件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统治者,但是这种统治是以简单商品交换、流通、买卖为媒介的。生产的目的是增殖交换价值”。^[13]这也就是说,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历史生成的现代资本关系,它以流通为前提,因为商品交换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中介,资本关系统治雇佣劳动的新型生产方式,恰恰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

其五,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物相化的具体运行机制。马克思认为,当生产资本通过使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统一的商品生产过程从形式上从属自己,也就使生产本身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生产资本支配下出现的生产目的是商品,“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始终以商品而不是以使用价值为基本形式,这种生产方式恰恰是以资本、货币同劳动能力的交换为基础”。^[14]这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关系为社会物相化的根本,于是,“整个生产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使用雇佣劳动已经不是社会表面上的偶然现象(sporadische Erscheinung),而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了(herrschendes Verhältnis)”。^[15]这也意味着,以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复杂的社会物相化进程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至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总体性。并且,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也不断地将这种新型的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奴役性的生产关系生产出来。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

的本质,这自然也会有一个从狭义生产关系构序到经济构式和政治法律体制物相化的逐步实现过程,这一社会物相化的彻底变革最终会通过以打碎旧的封建社会体制为前提,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政治场境的社会物相化空间,同时,社会物相化的附属物也会从教堂、皇宫和断头台脱型和转换为现代的议会大厦、证券交易所和警察局。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不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是这种关系本身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dieses Verhältnisses selbst)”,^[16]当生产过程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将不断地重复进行,资本只能在不断吸吮新鲜剩余价值血液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自己罪恶的生命力。如果面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总过程,那么“在结束时从过程中产生的,仅仅是在开始时进入这一过程的那些东西,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对象化劳动,另一方面是作为单纯劳动能力的非对象性劳动(gegenstandslose Arbeit),因此同样的交换始终在重新反复”。^[17]实际上,这种重复也就是整个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资本的最初条件,资本的最初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最初关系(ursprüngliches Verhältnis),在这个过程结束时就重新被创造出来了。因此,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Verhältnis von Capital und Lohnarbeit)就由这种生产方式再生产(reproducirt)出来,完全同商品和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一样。^[18]

这也就是说,从属于资本关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将增殖的资本与雇佣劳动能力同时再生产出来,这也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支配和盘剥雇佣劳动的奴役关系再生产出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物相化中整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场境再生产的真正基础。马克思说:

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可以得出结论:作为这个

过程的真正产品,应考察的不只是商品(尤其不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产品);也不只是剩余价值;虽然剩余价值是结果,它表现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目的并决定着这个过程的性质。不仅是生产一个东西——商品,即比原来预付的资本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而且是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wird Capital producirt und es wird Lohnarbeit producirt);换言之,是再生产关系(Verhältniß wird reproducirt),并使之永存。^[19]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产品,并非只是商品或者剩余价值,而是把资本统治和奴役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并同时创制出一整套维系这种奴役关系物相化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资产阶级通过意识形态编码力图粉饰这种生产关系并使之永恒化。在布尔迪厄那里,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被指证为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秩序”的过程。^[20]这种社会构序的再生产,恰恰是通过被压迫者身体化的惯习来“恢复”的。他指出:“社会世界秩序的恢复,秩序恢复只为那些习惯于领会它们的人而这样发生作用,它们唤醒了被深深隐藏在身体的性情货币,而不是通过意识和计谋的手段。”^[21]这是有道理的看法。可马克思还告诉我们,真实的社会事实却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日益恶化,并且,“资本主义生产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关系并使之日益尖锐化”。^[22]这当然会是资本主义自我消亡的前奏。

二、绝对剩余价值: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

马克思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过程的发展,整个从旧有社会生产关系脱型中突显出来的社会定在,开始从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转变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这示兆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胜利。这当然是一个新的重要判断。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或者说,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关系,说到底就是资本家怎样盘剥工人的

劳动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所以,马克思这里开始从上述旧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生产过程、劳动者、生产目的、劳动活动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思考集中为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工人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并结合他在《大纲》中区分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深入讨论了劳动本身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的过渡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创的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这样,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也就直接成为他在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第三个伟大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重要基础。马克思说:

无论如何,与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absolute Mehrwert)和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如果把它们分开来单独地加以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总是存在于相对剩余价值之前。与这两种形式相适应的,是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不同的从属形式(zwei getrennte Formen der Subsumtion der Arbeit unter das Capital),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不同的形式(zwei getrennte Formen der 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其中第一种形式始终先于第二种形式,尽管比较发展的形式即第二种形式,又可以构成在各新生产部门中实行第一种形式的基础。^[23]

这仍然是在阐释性话语中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存在形式的一个总体性的说明,但却是蛮绕人的一段表述。我觉得,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一种历史性透视中的新认识。这有三重历史性场境关系构式的联结:一是资本主义生产物相化的两种递进的历史形式是指我们已经熟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化大生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的科学判断。更深一层看,这也是从斯密到李嘉图,或者是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矛盾到李嘉图式的“机器生产难题”。二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

的两种经济形式为:与早期工场手工业生产相对应的绝对剩余价值以及后来机器化大生产相对应的相对剩余价值。这是对《大纲》中区分开来的两种剩余价值形式的不同生产基础的科学说明。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研究中,马克思还专门指认了资本控制下的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中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差异,相对于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限制,工业生产更容易使资本家获得延长工时的绝对剩余价值。^[24]三是与上述双重历史性关系相对应的,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换。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透视。其实,这三重社会场境关系赋型在直观经验的层面都是无法直接看到的,这深刻体现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非物像透视。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认识论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大纲》经济学革命成果的剩余价值理论,成了这里马克思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中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本质的前提。

第一,劳动对资本关系的形式从属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绝对剩余价值的直接榨取。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这似乎是一种可以直接看到的盘剥。显而易见,这里,马克思已经将资本家在平等交换的幌子下,通过无偿占有和盘剥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机制当作已经完成的理论前提,进一步探讨剩余价值本身存在的形式问题。马克思明确指认,“我把以绝对剩余价值(absolute Mehrwert)为基础的形式叫做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formelle Subsumtion der Arbeit unter das Capital)”。^[25]形式从属问题,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遭遇过,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前面的“形式从属”是特指旧式传统社会中的不同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而这里,马克思所指认的 formelle Subsumtion der Arbeit(劳动的形式从属)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构境层面,即主要是从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工人劳动本身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绝对剩余价值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原因在

于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中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过去传统上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的发生的强制剥夺是一致的,即“超过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劳动,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其他人进行劳动的这些生产方式,只有形式上的区别”。^[26]这里的“形式上的区别”是指不同于封建经济中直接的强制性掠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盘剥是经过“平等”交换的戏法伪饰的。不过,在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中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一点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关系,或者资本家之所以能够直接榨取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本质的东西”包括这样一些前提:第一,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式上公平的自由买卖关系的最初建立,这是劳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关系的关键。马克思说:

工人作为他自己的人身的所有者,从而作为他自己的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s)的所有者,以暂时被使用的这种劳动能力的卖者的身份,同拥有货币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他们双方作为商品占有者(Warenbesitzer),作为卖者和买者而互相对立,这样,他们双方在形式上是自由人(freie Personen),他们之间除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其他关系;不再存在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入序的关系(politisch oder social fixirtes Verhältniß der Ueber- und Unterordnung)。^[27]

这是一种社会关系赋型上的改变,在传统社会中,奴隶是奴隶主的直接所有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政治等级和社会地位上政治—神性构式负熵中固定的直接强制性 Unterordnung(入序)。马克思在此特意使用了不同于 Subsumtion(从属)的 Unterordnung(入序)。入序,也是指人与物进入到特定社会关系场境构序中有序性位置的被“编码”过程,这也是我在社会场境存在论中使用的概念。海德格尔也使用

过相近的 *Einordnung* (入序) 概念。^[28] 人的思想观念活动中也有逻辑入序问题,这不同于思想构境中的入境,入境是在一般逻辑入序之上获得的情境“顿悟”。马克思指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的**连续性**,是通过直接强制来保持奴隶的一种关系。相反,自由工人必须自己保持自己的关系,因为他作为工人而存在,取决于他不断重复地把自身的劳动能力出卖给资本家”。^[29] 现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人成了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这种政治上和社会关系物相化上的祛序与脱型,使他成为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商品),从而与“拥有资本的资本家”相对立。相对于旧式的奴隶,这显然是一种新的政治法权场境中的历史在场性。而马克思这里指认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主要是指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发生的形式上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如果再作一个深入一些历史性比较:一是“奴隶属于某个一定的主人;工人固然一定要把自己卖给资本,但并不是卖给某个一定的资本家,他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把自己卖给谁,他可以换主人”。^[30] 这是说,奴隶和工人的历史在场性是异质的,奴隶的在场是作为非主体性的“会说话的工具”,而工人已经成为独立的在场主体。然而,马克思指认出,工人的主体性在场只是在形式上获得了自由,因为这种自由的在场其实只是更换主人的自由。这是极其深刻的观点。二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买和卖的——**货币关系**掩盖着**无酬劳动**,而在奴隶劳动的情况下,奴隶属于其主人所有的那种所有权关系掩盖着**为自己的劳动**”。^[31] 形式上,工人在与资本家的所谓公平交易中获得了工资,实际上,他仍然是被资本家进一步盘剥的对象。所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把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变成新的**买卖关系**,并使剥削关系摆脱一切家长制的和政治的混合物。当然,在生产关系本身中,包含着来自资本对并入资本的劳动拥有所有权和来自劳动过程本身性质的**统治和入序关系** (*Verhältniß der Ueber- und Unterordnung*)”。^[32]

这就是说,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中,恰恰是通过可见的“买卖关系”,掩盖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

第二,劳动者完全丧失自己的劳动条件,这是劳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隐性依存性。马克思说,在第一种不可直观的“统治和入序”关系中嵌套着另一种更深的从属关系。

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原料,劳动工具,从而还有劳动时的生活资料)完全地或者至少部分地不属于工人,而属于工人劳动的买主和消费者,因而作为资本和工人自身相对立。这些劳动条件作为异己的财产(*fremdes Eigentum*)越是和工人充分对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formell das Verhältniß von Capital und Lohnarbeit*)也就越是充分,从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也就越是充分。^[33]

正是因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自由劳动者丧失了劳动条件,而这些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家的“异己财产”(资本关系的赋型物)与工人相对立,就使得一无所有的工人根本无法独立生存下去,在看不见的“饥饿的皮鞭”下,他只有通过出卖商品——自己的劳动能力,被迫入序于雇佣关系,在形式上“自愿”地从属于资本,这就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压迫和奴役本质。这里,马克思仍然没有透露自己已经完成的作为资本关系出现在生产过程的“劳动条件”是劳动的异化的深刻见解,他只是谨慎使用了 *fremdes Eigentum* (异己的财产)这一并不精准的阐释性表述。在不久之后爆燃出来的思想实验中,这将是劳动异化批判构式 III 中劳动异化的第一层面。

第三,劳动对资本关系形式上从属的剥削方式是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其现实基础是生产过程本身劳动主体性的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工艺技巧在场。这当然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基始性原则的直接体现。马克思分析道:

如果说这种统治和入序关系 (*Verhältniß der Ueber- oder Unterordnung*) 的产生代替了

奴隶制、农奴制、臣仆制、家长制的从属关系,那么所发生的只是形式上的转化(Verwandlung in seiner Form)。从属的形式变得更自由些,因为从属只是事物性的(sachlicher),在形式上是自愿的,涉及的只是工人和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地位。这也正是过去农奴或奴隶一经变为自由雇佣工人时在农业中所发生的那种形式变换(Formwechsel)。^[34]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对比分析。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劳动 Unterordnung(入序)于资本的统治和奴役关系开始只是 formelle Subsumtion(形式上的从属),关键是从事生产物相化的狭义的“生产方式本身(Produktionsweiseselbst)”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或者说,作为创造社会历史负熵质的“劳动过程从工艺(technologisch)来看完全和过去一样进行,只是现在它成了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35]这里意思是,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虽有了简单协作、劳动分工和工艺学上的初步进步,但工人的主体性劳动在生产物相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生产过程仍然是劳动者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实现出来的物相化过程,这与农耕时代的生产工艺基础是相近的。这恰是斯密经济学的历史基础。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早期工场手工业生产中,人对自然的劳动塑形和构序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关系的工艺基础(technologische Basis)是手工业生产(handwerksmässige Betrieb);在这种生产中掌握劳动工具的技巧的高低,是生产的决定性要素;独立的个人劳动,从而这种劳动要经过较长或较短学习时间而达到的职业提高,在这里都决定着劳动的结果”。^[36]所以,当主体性的爱多斯之相和劳动技艺还占据生产物相化过程的主导因素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仍然是不高的,这导致了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这也决定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主要通过可见的延长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这一点,与后来的机器化大生产中劳动的地位是

根本不同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会将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内在地连接起来。

三、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现实基础

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基础是资本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这是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发展的历史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性的历史胜利。相对于上述旧有生产过程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这里的实际从属,则表征了资本关系通过发展工业生产力,实现了一个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从生产过程中实质性地支配了社会定在的基础,并彻底巩固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式在社会物相化编码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reale Subsumtion)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relative Mehrwert)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37]这里的重点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正是由 relative Mehrwert(相对剩余价值)形式决定的。这里的 reale Subsumtion(实际从属,也可译为真实从属或实质从属),是马克思相对于 formelle Subsumtion(形式从属)的重要概念。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的重大进展之一。齐泽克也关注到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马克思论述了资本控制下的生产过程中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形式从属不等于实际从属,即资本首先将它遭遇的生产过程(工匠等)从形式上从属于自己,然后它才一步步地改变了生产力,使之与生产过程相一致”。^[38]实际从属的本质,是资本对生产力的改变所导致的相对剩余价值的隐性盘剥。齐泽克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或者资本对劳动的实质性的控制和统治,是机器化大生产中通过技术与科学信息编码力量将劳动降低为机器附庸来最终实现的相对剩余价值盘剥。这当然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

统治基础,归根到底还是由物质生产力的构序水平决定的。对此马克思说:

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从属下,在工艺过程(technologischen Proceß)、劳动过程中发生了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切变化,与这些变化同时,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Productivkräfte der sozialen Arbeit)发展了,并且只有随着这些变化一起,才有可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Anwendung der Naturkräfte im grossen, der Wissenschaft und der Maschinerie)。因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39]

依马克思的看法,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从生产过程中形式上的支配和控制转为实际上的牢固统治,是通过机器化生产中劳动性质和工艺技巧编码的彻底改变实现的,因为,科学技术之下对自然力的大规模应用,机器化的自动生产过程,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该书第十一章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问题讨论的重要性。这里发生的重要事件为:一是使原先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劳动主体占主导地位的改变对象的劳动过程,直接转换为机器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信息编码对象化应用和机器客观工序的客观编码和生产过程,劳动者彻底丧失了原先在工场手工业过程中的所有关键性地位,因为,生产物相化不再是工人的创制性爱多斯和劳作技能实现出来的过程,而成为远离劳动过程的科技物相化中科学爱多斯的反向应用,由此,工人在丧失自己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彻底沦为机器系统的附庸;二是资本家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方式,从可见的单纯延长劳动时间的绝对剩余价值,转换为无形的 relative Mehrwert(相对剩余价值)的盘剥。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经济剥削开始变得无法直观。这也是李嘉图在经济物

相化迷雾中彻底失去劳动价值论防线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马克思对李嘉图难题的真正解决,也是通过科学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而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相对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是李嘉图在利润名义下阐述的剩余价值的惟一形式”,^[40]在他的眼里,“一切由分工、机器的改进、运输工具的完善、对外贸易引起的改良,一句话,一切缩短制造和运输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方法,由于并且只要它们降低劳动的价值,都会增加剩余价值(就是说,也会增加利润),从而使资本家阶级发财致富”。^[41]然而,李嘉图却无法在自己面对的机器化大生产中坚持劳动价值论。这样,“无能”的劳动(主体)对无所不能的资本(在场的机器客体)更深一层的 reale Subsumtion(实际从属)关系就得以确立。马克思说,“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ät der Arbeit)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völlige Revolution)”。^[42]这一革命的结果,将是工人的劳动在生产物相化过程中主导性地位丧失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全面胜利。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资产阶级统治方式中最重要的胜利,也会是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真正开端。他说,“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从属)控制了农业,矿业,主要衣着布匹的生产,以及运输,交通工具,它便随着资本的发展,或是逐渐征服只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经营的其他部门,或是逐渐征服还由独立手工业者经营的其他部门。这就是资本的趋势”。^[43]资本先是控制了旧的生产方式中已经存在的所有生产领域,使之从形式上从属自己,然后再开辟属于自己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显见,也是这里,马克思开始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真正本质直接定义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从属(die reale Subsumtion der Arbeit unter das Cap-

ital)”。这里的劳动当然已经是特指资本关系中的雇佣劳动,这里的雇佣劳动在机器化大生产和科技物相化的结合中,真正实际地从属资本,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社会物相化(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得以确立。笔者以为,这会生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新的判断。马克思概括说,通过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c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扩展到以前还没有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些生产领域;也就是说,资本越来越占领总体性的生产领域 (Totalität der Productionssphären);

(2) 资本形成新的生产领域,也就是说,生产出新的使用价值,使新的劳动部门营业;

(3) 只要追加资本在同一生产领域中由同一资本家使用,部分地是为了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转变为在实际从属于资本,部分地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 (Stufenleiter der Production), 发展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是为了以更大的资本,以劳动条件的更程度的联合和分工 (grösserer Vereinigung von Arbeitsbedingungen und Theilung der Arbeit) 等等来进行生产,——那么这种积累就表现为积聚 (Accumulation als Concentration), 因为一个资本现在指挥更多的工人和更多的生产资料,而社会财富则以更大的规模联合在一个人的手中;

(4) 在每一个生产领域中,资本筑模 (Capitalbildung) 的这种过程是在社会表面的各个不同的点上进行的。^[44]

依笔者之见,这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的新成果。这里的表述包括这样一些方面:一是当资本将原来还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旧有生产领域变成实际上从属于自己的领域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地扩大到还没有从属于它的那些新的劳动部门(从而上述比例在这些新

的劳动部门中会发生变化)”,^[45]比如从自然经济中的农耕生产到工业生产物相化,从自然土地上的乡村到社会物相化空间中的城市,从国内商品买卖的经济物相化交换市场到更大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的海外殖民贸易,资本开始成为支配全部生产领域的社会 Totalität (总体性),即在社会定在基础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这里,我们遭到了这个 Totalität (总体性),显然,它与后来青年卢卡奇标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原则的 Totalität 并不完全是一个东西。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创造出一些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的使用价值”的生产领域,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新的、从一开始就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劳动部门”,^[46]比如如农耕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中不曾出现过的机械制造领域、城市建筑业和远程运输产业等。以后还会创造电子、化工、航空和生物技术等新型产业,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服务行业的“第三产业”、信息与网络产业、传媒产业等全新领域。在《大纲》中,马克思将其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 (System der allgemeinen Nützlichkeit)”。^[47]三是伴随着机器化大生产过程,生产与再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增加其中的投资,扩大生产的规模,发展和扩大了原先的生产方式”,^[48]特别是以科技物相化应用的机器系统为基础的更高水平的技术分工和结合被突现出来,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积累过程开始成为资本更大规模的集聚和垄断,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四是劳动和全部社会生活对资本关系的实际从属,开始成为 Capitalbildung (资本筑模) 中构序和赋型社会定在所有方面的根本因素。可以看出,这个 Bildung (筑模) 概念总是在说明生产方式的复杂动态生成时出现。也是在这一重要基础上,前述所有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旧的生产方式中的不同产业、生产部门和整个社会生活,以及资本主义自己创造的全新社会定在,现在开始完全从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统治关系,

“资本的趋势”就是征服整个世界,创造自己的资本的世界历史。在这里,马克思再一次强调说:

资本的发展不是始于创世之初,不是开天辟地就有。这种发展作为凌驾于世界之上和影响整个经济的社会赋型(ökonomische Formation der Gesellschaft)的某种力量,实际上只是到16世纪和17世纪才出现。这是它的童年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只有随同大工业一起才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还仅仅是零散的发展),因此,它在整体上只是从18世纪后30年起才开始出现。^[49]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它“作为凌驾于世界之上和影响整个经济的社会赋型”,并不是开天辟地就存在,而是一步步历史发展而来的。这是马克思已经多次说明的问题。即便是在《大纲》中,马克思还会使用那个历史性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而在此,他却坚定地使用了c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表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童年的16—17世纪,到18世纪后30年的成年,从旧有的社会生活在形式上从属资本关系到整个社会定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花了近300年的时间。依马克思的判断,

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须切入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场境(historische Gestalt)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现实历史(wirkliche Geschichte d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但是,对这些生产关系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erste Gleichungen),这些方程式将显示出隐藏于这个制度背后的过去。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以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

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sich selbst aufhebende),从而正在为未来社会创造历史前提(historische Voraussetzung)的生产条件。^[50]

这表明,虽然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它的永恒性。我们通过历史认识论的分析,获得了一些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的“原始方程式”,这些erste Gleichungen(原始方程式)或者原初经验数据,恰恰是我们今天历史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复杂关系场境的历史依据和“曾在”参照点。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发生的劳动异化和事物化的曾在相对值尺度。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涉及到“原始方程”这一重要的问题。^[51]因为,这是马克思在历史现象学基础上重构劳动异化构式III的逻辑基点。这同时也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同资本主义所超越的所有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会成为历史辩证法运动中“扬弃自身”,“为未来社会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这当然是科学社会主义更重要的结论。

注释:

[1][3][4][5][7][8][9][12][14][15][16][17][18][19][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103、103、104、108-109、155、115、115、117、124、128、129、128-129、181、161-162页。

[2]物相化,这是笔者在本次研究中从马克思思想中提炼出的新概念。物相一词,笔者在《回到马克思》中已经使用。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phase又称“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实物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笔者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却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来缘起。因为日本学界在日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

的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 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Karl Marx, *Grundrissen, Gesamtausgabe (MEGA2)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21;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MEGA2)II/4 - 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47。当然,人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工业生产中机械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爱多斯(eidos)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MEGA2)II/3 - 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83。

[10][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9、3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20][法]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14页。

[21][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谭立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06页。

[23][25][26][29][30][31][32][35][36][37][39][42][43][45][46][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84、284、284、289、290、289、292、285、285、297、297、298 - 299、304、414、414、414页。

[24][40][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4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472、479页。

[27][33][34][44][49][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84、285、285、393 - 394、581、452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MEGA2)II/3 - 6,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S. 2130, S. 2130, S. 2131, S. 2223, S. 2375, S. 2270。

[28]海德格的原语为:“普遍化可以被视为一种构序方式(Weise des Ordnens)。经此构序方式,就可以把一定个体的单方面因素入序(Einordnung)到一个交叉协调的事物关联与境(Sachzusammenhang)之中”。[德]海德格尔:《形式化和形式显示》,欧东明译、张祥龙校,《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参见 *Gesamtausgabe*, Band 60,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5, S. 60。

[38][斯]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中译文有改动。译者将这里的 subsumption(从属)误译作“包含”,这样就完全误解了齐泽克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理论的解释。马克思在德文中原来使用的是 Subsumtion。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 - 390页。中译文有改动, Karl Marx, *Grundrissen,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MEGA2)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322。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3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